

明代“佛郎机黑番”籍贯考^{*}

廖大珂

黄金、香料和奴隶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方殖民者在海外掠夺的三大主要“商品”,其中黑奴贸易是西方殖民扩张史上最黑暗、最血腥的一页。

最早从事黑奴贩运的西方殖民者是葡萄牙人。在葡萄牙殖民者的眼中,黑奴不仅指非洲人,而且也指其他地区的一些民族,因为葡萄牙人往往将比他们肤色深的东方民族统称为黑人,尤指非洲黑人、马来人、印度人、帝汶(Timor)人等。1441年,葡萄牙人第一次在西非海岸博哈多尔角(C. Bojador)以南捕获了一批黑人,并把他们带回葡萄牙,卖为奴隶,从而揭开了长达500年的近代奴隶贸易的序幕,因此葡萄牙人被称为近代奴隶制的“鼻祖”。葡萄牙人在东方不仅从事贩运奴隶的活动,而且还驱使黑奴作为其侵略工具,实际上从一开始葡萄牙的东方远征队便主要从其从东方一些国家掠夺来的奴隶尤其是黑人组成,葡萄牙白人只占少数。16世纪初,葡萄牙殖民者东来后,便把贩奴活动带到中国。他们在中国东南沿海大规模地贩运奴隶,不仅从中国掠走大量人口,而且也向中国输入其掠自亚、非一些国家的奴隶。这些奴隶即明清时期所谓的“佛郎机黑番”。“佛郎机”者,殆为阿拉伯人对欧洲人的称呼“Frangi”(源于Frank)的译音,在明代多用以指葡萄牙人,当时中国人称葡萄牙人为“佛郎机”,是根据东南亚国家的伊斯兰教徒对欧洲人的称呼转译来的;“黑番”则是指葡萄牙人所贩运或役使的黑人。明代“佛郎机黑番”在葡萄牙人对中国的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葡关系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然而以往国内外学术界对“佛郎机黑番”的研究较为薄弱,近年来始有所重视,但主要是研究澳门的黑人,对于早期来华的“佛郎机黑番”来源的探讨尚嫌不足,仍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一、史籍记载中“佛郎机黑番”的籍贯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四月,明朝军队扫荡葡萄牙人在浙江双屿的巢穴,双方发生激战,明军俘获了一批佛郎机人,其中包括3名“黑番”。浙江巡抚兼管福建福州、兴化、建宁、漳州、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基金项目“中国与东南亚关系”(项目号:05JJDGW010)的阶段性成果。

参见弗朗索瓦·拉托尔·达贝加·平托著、李活译:《葡萄牙人参加奴隶贸易:葡萄牙社会内部的对立势力和思想倾向以及奴隶贸易对葡萄牙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载《15—19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第123页。

有关澳门黑人的研究主要有:葡]Pe Manuel Teixeira(文德泉),《O Comercio de Escravos em Macau》(《澳门奴隶贸易》),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6; [德]R·普塔克著、关山译:《澳门的奴隶买卖和黑人》,载《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金国平、吴志良:《郑芝龙与澳门——兼谈郑氏家族的澳门黑人》,载金国平、吴志良:《东西望洋》,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2年(又载《海交史研究》,2002年第2期);汤开建、彭蕙:《黑人:明清时期澳门社会中的一种异质文化景观》,载《世界民族》,2004年第2期;彭蕙:《16—19世纪澳门黑人的社会职能》,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汤开建、彭蕙:《16—19世纪澳门“黑人”来源考述》,载《世界历史》,2005年第5期。

泉州等处海道提督军务朱纨在战后的奏报中提及这 3 名“黑番”的籍贯：“生擒哈眉须国黑番一名，法里须；满咖喇国黑番一名，沙哩马喇；咖味哩国极黑番一名，嘛哩丁牛”。

关于上述“满咖喇国”、“哈眉须国”和“咖味哩国”，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所谓满咖喇者，非 Bengal(孟加拉——引者)即 Mangabr(印度的门格洛尔，今作 Mangalore——引者)，否则必系满喇咖(Malacca)之倒写。哈眉须即 Habish(Abyssinia,阿比西尼亚，即今埃塞俄比亚——引者)，咖味哩似言 Galle(斯里兰卡的加勒——引者)。”藤田氏仅据音训而发一己之臆测，未深入考证，显然不足凭信。中国学者沈福伟的《中国与非洲》一书则认为：“1548 年(嘉靖二十七年)朱纨平息双屿，在俘获的六七十人中，有黑番鬼三人。一名沙里马喇，满咖喇(摩洛哥)人，善使船观星象，被葡人雇用。另二人都是从小被葡人掠买的非洲黑奴。一名法哩须，哈眉须(埃塞俄比亚)人，十岁时被葡人收买为奴。一名嘛哩丁牛，咖味哩(苏丹黑人)人，也是幼年被卖为奴。二人从小在海上长大，‘驾船在海’。”沈氏将上述地名不问青红皂白，任意杜撰，一概置于非洲，以致张冠李戴。然而却少闻中外学者对此有持异说者。究其原因，盖因地名之考证殊非易事，学者往往有难以措手之感，故鲜有问津者矣。但来华之佛郎机人中“黑番”占了极大比例，甚至多数。如嘉靖二十七年(1548 年)六月“十一日，佛狼机大船八只，哨船十一只攻(福建宁德)沙头澳，人身俱黑”；七月又烧劫黄崎澳居民，为明军所败，明军“擒获夷贼呵哩庵陀呢寺、呵呢低寺、喝斯班陀弥、吉林喝哪、班哩吻、呵多泥佛郎、头婆勾周哪、文庵密寺、沙改通吕哪、日本和尚一十六名”，“及审诸番各贼，俱凹目黑肤，不类华人”。同年八月，葡萄牙牛头大番船和中国私商的哨船“俱在温州地名大门海洋”，浙江都司都指挥梁凤调福建兵，“合势挟攻，贼众伤死下水不计，冲破沉水哨番船一只，生擒黑番鬼共帅罗放司、佛德全比利司、鼻昔吊、安朵二、不礼舍识、毕哆啰、哆弥、来妈(奴)八名”。翌年三月中，葡走马溪之战，明军“擒夷王三人、白番十有六、黑番四十六，皆狞恶异状可骇”。由此可知，其时来华的所谓“佛郎机人”中，其实大多数是“黑番”，“白番”不过少数而已，因此有必要对上述三国名重新详加考证，以弄清明代“黑番”的来源地。

二、满咖喇国考

朱纨《三报海洋捷音事》云：浙江沿海的走私商人“(胡)胜与胡钰、吴如庆、车再一、谭明才同未获贼首许栋，伊侄许十五，即许社武，另案先获监故弟许六，见监绍兴府族弟许四，各不合与先获监故林烂四等，故违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响导，劫掠良民者，正犯处以极刑，全家发边卫充军事例，各造三桅大船，节年结伙，收买丝绵、絀段、磁器等货，并带军器，越往佛狼机、满咖喇等国，叛投彼处。番王别球佛哩、类伐司别哩、西牟不得罗、西牟陀密啰等，加称许栋名号，领彼胡椒、苏木、象牙、香料等

朱纨：《暨余杂集》卷 2《捷报擒斩元凶荡平巢穴以靖海道事》，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78 册，齐鲁书社，1995 年，第 40 页。所谓“黑番”，指葡萄牙船使用的黑奴。

旧 藤田丰八著、何健民译：《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 417 页，注 17。

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1990 年，第 491 页。

朱纨：《暨余杂集》卷 5《六报闽海捷音事》，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78 册，第 135—136 页。

朱纨：《暨余杂集》卷 9《犒赏有功官兵以励人心事》，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78 册，第 237—238 页。

朱纨：《暨余杂集》卷 4《三报海洋捷音事》，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78 册，第 80 页。

王士骐：《皇明驭倭录》卷 5，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53 册，齐鲁书社，1996 年。有关中、葡走马溪之战的情况，另见朱纨：《暨余杂集》卷 5《六报闽海捷音事》，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78 册，第 131—133 页。

物,并大小火铳、枪刀等器械,及陆续引带见获番夷共帅罗放司、佛德全比利司鼻昔吊、安朵二、不礼舍识、毕哆啰、哆弥、来奴、和尚、利引、利舍、(利)璽,先获见监沙哩马喇等、倭夷稽天等,俱随同下船,胜与许栋等陆续招集先获陈四、胡霖等,今获谢洪盛、徐二、浦进旺千种等不记姓名千余人,各不合与已斩首来童、陈明、安朵二、放司琉个哆连、满度喇等,已死啰毕利哑司等,故违强盗积至百人以上,不分曾否伤人,俱臬首示众事例,盘据浙江霏衢大海双屿港内,时常调拨快马哨船出港,劫虏浙江、福建沿海居民,勒要赎银,杀人放火,不计起数”。朱纨的奏报披露了一个史实:当时的“满咖喇国”已为葡萄牙人所据,系中国走私商人经常问津之地,著名的海寇商人首领许氏兄弟等人时常往来于中国与“满咖喇国”之间,勾引葡人来到浙江海域,盘踞双屿港,进行武装走私活动。

此“满咖喇国”究竟指何地?

先谈孟加拉、印度和摩洛哥。早在唐宋时期,中国帆船已航行于印度洋,造访印度半岛各国,甚至远达波斯湾、东非海岸。明初郑和下西洋,中国船队纵横于辽阔的印度洋上,遍历沿岸包括今孟加拉、印度等国家和地区,把中国人在印度洋的航海活动推向高潮。然而,自郑和下西洋之后,明朝放弃了早先的海外扩张政策,加之受明朝海禁政策的影响,中国船队已不再进入印度洋,亦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许氏兄弟曾在印度洋活动或与占据孟加拉和印度的葡萄牙人有过交往,更不用说前往摩洛哥投靠葡萄牙人,而且从当时的形势和航海技术来看,许氏兄弟经常往来于孟加拉或摩洛哥和中国之间实无可能。因此,满咖喇为孟加拉、印度门格洛尔或摩洛哥乃为无稽之说。

关于许氏兄弟集团从海外勾引葡人来浙江海域之事,明人郑舜功亦有记载:“浙海私商始自福建邓獠。初以罪囚按察司狱,嘉靖丙戌(五年,1526年)越狱遁下海,诱引番夷私市浙海双屿港,投托合澳之人卢黄四等,私通交易。嘉靖庚子(1540年),继之许一(松)、许二(楠)、许三(栋)、许四(梓)勾引佛郎机国夷人(原注:斯夷于正德间来市广东,不恪,海道副使王鏊驱逐去,后乃占满刺加国住牧,许一兄弟遂于满刺加而招其来),络绎浙海,亦市双屿、大茅等港。”显然,郑舜功的记载与朱纨的奏报说的都是一回事。由此可证,满咖喇与满刺加系同一地,满刺加乃“Malacca”之译音,又译满喇咖,今译马六甲,“满咖喇”为“满刺加”之倒置,许氏兄弟所勾引的葡萄牙人乃来自满刺加。

但是“满咖喇”为马六甲最直接的证据,是朱纨在《三报海洋捷音事》中所提及的“满咖喇”的四个“番王”,其实就是1539—1548年间相继担任马六甲要塞司令的葡萄牙人首领。其一,别球佛哩,即 Pero de Faria,曾于1528—1529年、1539—1543年间两度出任马六甲要塞司令。其二,类伐司别哩,即 Rui Vaz Pereira Marramaque,于1543年接替别球佛哩出任马六甲要塞司令。其三,西牟不得罗,即 Simão Botelho,曾任果阿(Goa)财政监督,1544年受葡萄牙果阿总督的派遣,到马六甲主持关税制度的改革。当时的要塞司令类伐司别哩拒绝改革,1545年类伐司别哩死后改革才得以实行。其四,西牟陀密啰,即 Simão de Melb,于1545—1548年任

朱纨:《鹭余杂集》卷4《三报海洋捷音事》,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8册,第82页。

参见《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中华书局,1982年。另见刘斧:《青琐高议》别集卷4《王榭》(第127—128页)、前集卷3《高言》(第30—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参见 C. R.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 Empire, 1415 - 1825*,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9, p. 43.

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6《海市》,1939年影印本,第2页。

参见 英 理查德·温斯泰德著、姚梓良译:《马来亚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67页。

马六甲要塞司令。他在任期间,葡萄牙旅行家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从马六甲乘坐“一条属于城防司令(即马六甲要塞司令)西蒙·德·梅洛(Simão de Melo)的大船去日本做生意”。

朱纨在《三报海洋捷音事》中准确地记录了1539—1548年之间马六甲葡人历任“番王”之姓名,朱纨奏文中所谓满咖喇当为满刺加即马六甲,可确定无疑。

满刺加原是暹罗的藩属,1405年(永乐三年)其酋拜里迷苏刺遣使向明朝廷进贡,被明成祖朱棣封为满刺加国王。满刺加遂从此摆脱暹罗而独立,并迅速发展成为东南亚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因此吸引了许多中国商人前往满刺加贸易。

1509年,葡萄牙人德塞凯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于9月11日抵达马六甲,在那里见到“3艘属于中国人的船”,“当他们看到我们船只的配备时,尽管事先已被回教徒警告过我们是可疑的人,但他们立刻就对我们产生了迥然不同的印象。这个印象所反映出的凭证就是,他们的船安心地、信任地在我们四周摆渡,并且非常靠近”。“他们向司令(指德塞凯拉——引者)的船驶来,司令高兴地接待他们,并奏乐和鸣放礼炮……他们谈论很多事情,互相询问对方国王和王国的事情”;“谈了好长一段时间后,中国船长请司令和船长们改天去他们的船上吃晚饭。司令接受邀请前往赴宴。”这是葡萄牙人第一次与中国人发生直接接触。

1511年7月,葡萄牙驻印度总督亚伯奎(Afonso de Albuquerque)率领舰队从果阿航抵马六甲,“向这个胆敢袭击洛佩斯·德·塞奎拉的城市大兴问罪之师,并迫使它变成葡萄牙的一个永久据点”。他在马六甲外海见到中国船,并与中国商人交谈。“他很喜欢与他们交谈,由于传闻中国皇帝有很大权力,领土广阔,以致充满财富,亚伯奎可以从中国商人的言谈举止中判断这些传闻的真实性。”当亚伯奎下令焚毁古吉拉特人(Gujarates)的船只时,并没有伤害其他在马六甲港中的外国船,其中有5艘是中国人的帆船。因此,中国商人提出用自己的水手和船帮助亚伯奎作战。但亚伯奎仅利用中国商人的小舢舨来送他的人登陆,此外没有接受中国商人的帮助。亚伯奎还请中国人多呆几天,看马六甲是什么样的结局,然后把所发生的一切消息带给中国的皇帝。因此中国商人便与马六甲的葡萄牙人建立起友好的关系。

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不仅使亚伯奎牢固地树立了印度洋主人的地位,而且打开了向太平洋扩张的大门”。葡萄牙人以马六甲为跳板继续扬帆北上,但无论他们何时来到中国,都把自己说成是来自马六甲而不是葡萄牙,^⑩企图利用中国与马六甲(满刺加)的传统友好关

葡 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著、金国平译:《远游记》,澳门,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等,1999年,第617页。

“德塞凯拉”系按《葡萄牙语姓名译名手册》(新华社译名室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的译法,有人将其姓译作“德·塞奎拉”。

C. R. Boxer, “Notes on Chinese abroad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Manchu Periods Compiled from Contemporary European Sources, 1500 - 1750”, in *T'ien Hsia Monthly*, vol IX, No 5, Shanghai, Dec 1939, p. 449.

作者佚名、杨平译:《葡萄牙人发现和征服印度纪事》,载澳门《文化杂志》第31期,1997年,第27页。

按《葡萄牙语姓名译名手册》的译法,其中文译名应为“阿丰索·德阿尔布开克”。“亚伯奎”系此人在《明实录》、《明史》等中国古籍中的译名,后为许多中国学者所沿用。本文也沿用这个译名。

美 查·爱·诺埃尔著、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翻译组译:《葡萄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33页。

C. R. Boxer, “Notes on Chinese abroad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Manchu Periods Compiled from Contemporary European Sources, 1500 - 1750”, in *T'ien Hsia Monthly*, vol IX, No 5, Shanghai, Dec 1939, p. 450.

参见 Braz de Albuquerque, *The Commentaries of Great Afonso Dalboquerque, Second Viceroy of India*, Hakluyt Society, London, 1875 - 1884, vol III, pp. 97 - 99.

K. M.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tion: Survey of the Vasco da Gama Epoch of Asian History*, London, 1953, p. 50.

⑩ 参见 Ronald Daus, *Portuguese Eurasian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1989, p. 6.

系,来打开对中国贸易的大门。因此,在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的最初年代,中国商人在马六甲的贸易不仅未受不良影响,反而有所发展,中国商船仍源源至此贸易。当时马六甲的葡萄牙代理商路易·德·阿劳乔(Ruy d'Araujo)在给亚伯奎的信中写道:“中国人于4月来而于5月启航回返……一次航行约花20至30天。他们带来琥珀、锦缎、花缎、樟脑和一些大黄、珍珠……非常好的明矾。每年约有8或10艘平底船来此,他们带走许多胡椒与一些丁香。”1515年1月6日,意大利籍葡萄牙航海家科萨里(Andrea Corsali)写信给德梅迪西公爵(Duke Giuliano de Medici,有中国学者将其姓译为“德·麦地奇”):“中国商人也常航海越过大海湾,到马六甲做生意,以交换香料。他们从中国带来麝香、大黄、珍珠、锡、瓷器和生丝,以及一切由丝织精制的绸、缎、锦绣、绫罗等华丽品,因为他们拥有和我们一样水准的纺织技术……我相信他们是异教徒,虽然他们之中可能有人已经接受了我们的信仰。”葡人皮雷斯(Tome Pires)则说,马六甲有“许多克令(Keling)商人(指南印度商人——引者),一些爪哇、波斯和孟加拉国人,一些来自巴赛西和彭亨的人,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琉球人和来自渤泥的人。……马六甲又恢复到过去的繁荣……比起与马来人的交易,他们更加乐于与我们交易,因为他们对我们要更加真诚和公正得多”。由此可见,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之后,竭力利用中国商人来打开与中国的贸易之门。因此,许栋兄弟既然在马六甲受到葡萄牙人的欢迎,何以要舍近求远、不远万里跑到印度或孟加拉甚至摩洛哥去“勾引”葡萄牙人?

亚伯奎攻占马六甲后,在当地掳掠了一批少男少女,准备送回国献给葡萄牙国王和王后当奴隶。从此马六甲的葡萄牙人便开始了奴隶贸易。不言而喻,明代的“佛郎机黑番”中有一部分是来自马六甲的马来人奴隶,但亦有来自非洲的黑奴。关于黑奴的买卖,朱纨写道:“佛郎机夷由暗洋出交址入广入闽……黑青本来魑魅种,皮肤如漆发如卷,蹠跳博兽生能啖,战斗当熊死亦前,野性感谁思豢养,贼兵得尔价腰缠。(原注:此类善斗,罗者得之养驯,以货贼船,价百两数十两。)”罗者,又作罗阁,即马来语“Raja”、“Rajah”的译音;印度南方语言分别作“Rai”、“Rao”、“Rana”、“Rauai”、“Raya”,皆源出梵语“raj”,本意为“国王”,但在东南亚和印度南方也用以指贵族、首领。当时东、西方许多国家广泛使用“皮肤如漆发如卷”的黑奴,需求量很大,故东南亚国家、印度和阿拉伯各国都蓄奴成风,并在市场上出售。葡萄牙人从当地罗阁那里购买黑奴,每名值银数十两以至百两。明人王士性曰:黑奴,“买之一头,值五六十金”。马六甲成为“佛郎机黑番”最重要的来源地之一。葡萄牙学者徐萨斯在《历史上的澳门》中称:1563年时,澳门就有900名葡萄牙人和数千名奴隶,这些奴隶中的一部分人就来自满刺加。

除了买卖奴隶之外,葡萄牙人在东方的航海中雇用东南亚当地“黑人”充当水手也是司空见惯之事。葡萄牙人末儿丁·甫思·多·减儿曾致函国王汇报中国之行的情况:“我于去年

转引自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编),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励委员会,1988年,第198页。

Sir 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 I, Hakluyt Society, London, 1915, p. 180.

Amando Cortesao,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e Pires*, vol. II, London, 1944, p. 283.

参见严中平:《老殖民主义史话选》,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548—549页。

朱纨:《鹭余杂集》卷10《得归九首》,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8册,第263页。

参见 H. Yule and A. C. Bumell (eds.), *Hobson - Jobson: Glossary of Colloquial Anglo - Indian Words and Phrases and of Kindred Terms*, London, 1903, p. 754.

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中华书局,1981年,第101页。

参见 葡 徐萨斯 (Montalvo de Jesus) 著,黄鸿钊、李保平译:《历史上的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年,第32页。

一五二二年离开满刺加前往中国。我获悉,因我们的人在那里夺取了平底帆船,爆发了战争,有葡萄牙人被杀”。“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印度,传来的消息令人胆战心惊。一些人几乎空手而归,另外一些人被救回要塞。……只有上帝知道如何在印度得以逃生的人留在苏门答腊及满刺加。他们流窜、染病、死亡,因此,只得花钱请当地的黑人驾船,协助航行”。在双屿之战被明军俘获的满咖喇人沙哩马喇因“善能使船观星象”,被葡萄牙人以“每年将银八两雇佣驾船”。据说从亚伯奎的时代起,葡萄牙从事亚洲内部贸易的帆船就越来越依靠在几个白人或欧洲人官员指挥下的亚洲海员,甚至定期往返于果阿、澳门和长崎之间的1000—2000吨的大帆船,可能除了船上的官员和10—20名士兵炮手之外,其他船员全是亚洲人和黑奴。

三、哈眉须国考

关于哈眉须,汤开建、彭蕙认为:“音近者有《郑和航海图》中的‘哈甫尼’,即东非之哈丰角(C. Hafun,又作 Ras Xaafuun),还有马鲁古群岛(Kep. Maluku)的主要岛屿哈马黑拉(Pulau Halmahera)音亦相近”。然而,无论是哈丰角还是哈马黑拉岛的读音,与“哈眉须”都相去甚远,尤其是最末音节与“须”无法对应,所以汤、彭二人亦感到“无法确证”。有学者把哈眉须黑人与巴布亚黑人联系起来,则也是没有根据的。1526年,葡萄牙人若热·德梅内塞斯(Jorge de Menese)从马六甲驶往马鲁古群岛,但海风把船吹到一无名之地,才“发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岛。德梅内塞斯把它取名“巴布亚”,“巴布亚”源出马来语“tanah pepua”一词,意即卷发人的土地。1545年葡萄牙人奥尔蒂斯·德雷特斯(Ortiz de Retes)到达该岛北部,见当地的气候和居民肤色与非洲几内亚大致相仿,故取名“新几内亚”。葡萄牙地理学家加布列尔·雷贝洛(Gabriel Rebelo)曾任马鲁古群岛行政长官和要塞司令,他于1569年撰《马鲁古情况通报》,在谈到巴布亚群岛时写道:“除了拜桑低地适宜航行外,还有很多岛屿、低地和浅滩,那里是不能航行的。”他还说,居民们“在当地除了一些用以赎身的黄金外,他们没有任何商品。在这些居民中,有些是白人并长有雀斑,他们不能见阳光”。可见直至1545年,葡萄牙人还只是航行到巴布亚,对该地的了解不多,更没有从事其他的活动。而根据沈福伟在《中国与非洲》中所说法哩须10岁时被葡萄牙人买卖为奴来推算,则其事应在1532年,故法哩须不是巴布亚人。

从对音和史实来考察,哈眉须应是“Omuz”或“Homuz”,准确译音为“霍尔木兹”。在葡萄牙人的档案中,霍尔木兹(Homuz)又拼作“Omuz”。早在欧洲殖民者东来之前,霍尔木兹就是联结欧、亚海上交通的枢纽和贸易中转港。马可·波罗曾于1272年与1293年两度造访此港,他记曰:在波斯湾“海边有一城,名曰忽鲁模思(Omus)。城有港,商人以海舶运载香料、宝石、皮毛、线绸、金锦与象牙暨其他货物数种,自印度来此,售于他商,转贩世界”。元人

金国平:《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末儿丁·甫思·多·减儿信函,载《濠海丛刊》,澳门基金会,2000年,第177页。

朱纨:《鹭余杂集》卷2《议处夷贼以明典刑以消祸患事》,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8册,第43页。

参见C. R.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me Empire, 1415 - 1825*, p. 57.

汤开建、彭蕙:《黑人:明清时期澳门社会中的一种异质文化景观》,载《世界民族》,2004年第2期,第64页。

参见王颢:《鬼奴雇买——明、清之际中国沿海所见“黑番”考》,载 <http://www.studa.net/li Shi/060517/10273481.html>。

转引自葡雅依梅·科尔特桑著、王庆祝等译:《葡萄牙的发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7年,第1285页。

意·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3—114页。

汪大渊也说：于此装船东运的所有木香、琥珀之类，均产自佛朗（Frank的译音，指欧洲）国，商贩于西洋互易；中国商船则载运丁香、豆蔻、青缎、麝香、红色烧珠、苏杭色缎、苏木、青白花器、瓷器、铁条等至此交换欧洲产品。《明史》则云：“忽鲁谟斯，西洋大国也……其国居西海之极，自东南诸邦及大西洋商舶，西域贾人，皆求贸易。”在葡萄牙人东来之前，阿拉伯、波斯和欧洲的马匹经霍尔木兹销往东方，其中大部分再通过坎贝（Cambay）和果阿销往印度斯坦的各个大的王国。而来自东方满载各种商品的“船只从波斯的入口处的霍尔木兹上行，抵达巴士拉。大马士革、阿勒和特拉布宗的商队从那里把香料及其他赢利丰厚的商品运往黑海或叙利亚的大港口，而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再到这些港口来购买”。英国学者博克瑟（C. R. Boxer）曾如此评论：“霍尔木兹城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转运港之一，尽管它所处的岛上除了盐和硫磺别无所产。但是它除了在印度尼西亚香料和阿拉伯马匹贸易中享有巨大的份额外，印度与波斯之间几乎所有的贸易都要经过它。它的铸币，金币和银币，在印度、波斯、阿拉伯甚至远到东方的马六甲的所有港口流通。”因此，当葡萄牙人闯入印度洋时，发现了一个庞大的贸易体系、一个完整的海上贸易交通网，霍尔木兹则处于这张网络的中心地位。

鉴于霍尔木兹的战略地位，葡萄牙人很早就觊觎霍尔木兹。大约在1506年，葡王曼努埃尔（D. Manuel）在写给葡萄牙第一任印度总督德阿尔梅达（D. Francisco de Almeida）的信中，就指令应该在霍尔木兹等地建立要塞，“一旦建立了要塞，我们的……武装部队就应该与亚伯奎驻扎在那里，在亚伯奎的指挥下，我们的舰队可以保卫和维护进入红海大门的安全，并捕获穆斯林的船只。他们将利用从穆斯林那里得到的掳获品在他（指亚伯奎，后同——引者）认为合适的地方如锡兰、柏柏拉（Barbara）和亚丁（Aden）建立贸易。他应该到霍尔木兹和坎贝，了解那些地方的一切，以及我们希望的如何获得巨大的利润”。

1507年，亚伯奎率领葡萄牙远征队从位于阿拉伯海的索科特拉（Socotra）向霍尔木兹进发，他首先摧毁了马斯喀特（Mascat），然后用武力迫使霍尔木兹国王赛法丁（Ceifadin）签订城下之盟。赛法丁向葡萄牙称臣纳贡，并同意葡萄牙人建造要塞。1515年，亚伯奎夺取了霍尔木兹，在此留驻了一支强大的葡萄牙军队和船队，并任命了总督，开始了对霍尔木兹的统治，从此霍尔木兹成为葡萄牙海上帝国的重要据点。人们描绘当时葡萄牙在霍尔木兹的要塞是“印度的要害，全世界和威尼斯的人都经常来往于此……因为它是波斯、土耳其、莫卧儿直至中国以及其他国王和强大君主的边境”。在葡萄牙人占领下的霍尔木兹，“作为一个港口，向经过巴士拉和巴格达、伊斯法罕和伊朗高原的几条贸易路线提供来自东方的货物”，因此成为葡萄牙人最有利可图的贸易据点。在16世纪40年代，葡萄牙人每年在霍尔木兹的关税收入超过了马六甲的数倍，于此可见霍尔木兹在葡萄牙海上殖民帝国中的重要地位。

参见汪大渊原著、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校释·甘埋里》，中华书局，1981年，第364页。

《明史》卷326《忽鲁谟斯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8452页。

葡 雅依梅 科尔特桑著、王庆祝等译：《葡萄牙的发现》，第1181页。

C. R.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me Empire, 1415 - 1825*, pp. 40 - 41.

参见 葡 雅依梅 科尔特桑著、王庆祝等译：《葡萄牙的发现》，第1179—1181页。

M. J. Pintado, *Portuguese Documents on Malacca*, vol I, Kuala Lumpur, 1993, p. 3.

同上，第xvi页。

印 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著、何吉贤译：《葡萄牙帝国在亚洲》，澳门，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1997年，第165页。

参见 印 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著、何吉贤译：《葡萄牙帝国在亚洲》，第102—103页，表4.3、4.4。

自古以来,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就有奴役非洲黑人的习俗。在阿拉伯帝国时期,黑奴被大量输入中东地区。在阿拔斯帝国时期,阿拉伯地区的黑奴已经有上百万人之多,并曾发动大规模起义。例如 869—883 年的黑奴起义,参加起义的黑奴超过了 20 万人,因阿拉伯人称东非海岸的黑人为“赞吉”(Zanj),所以这次起义又称“赞吉起义”。

在 1550 年前后,霍尔木兹大约有 5 万多人口,其中葡人只占极少数,仅约有 150 名葡萄牙人和“黑人”居民。当然,这些“黑人”居民并非纯非洲黑人血统,而主要是古代非洲黑人与阿拉伯人或波斯人混血的后裔,肤色较纯种的黑人稍浅,故不属于“极黑番”之列。同在其他地方一样,葡萄牙人在霍尔木兹也大量役使黑人。1622 年,英国和波斯的联军企图攻占霍尔木兹,经过激战被葡萄牙人击败,然而“极大部分战功都属于黑人,葡萄牙人驱赶他们前进,并投掷火药瓶,许多波斯人因此被可怜地灼伤和烧伤”。

霍尔木兹也是葡萄牙人向中国输入黑奴的一个重要来源地。

四、咖味哩国考

咖味哩,译自葡语“Cafre”、“Cafraria”。葡语“Cafre”源自阿拉伯语“Kafir”、“Kaffir”,意为“异教徒”,原指非洲南部不信奉伊斯兰教的黑人。在葡萄牙语中,“Cafre”指黑种人;“Cafraria”指黑种民族之地,尤指东非黑人居住的地区。朱纨用“极黑番”来形容咖味哩人,以区别于其他地区的“黑番”,也表明所谓“极黑番”是指肤色深黑的非洲黑色人种。藤田丰八所云“咖味哩似言 Galle”不确。

东非的黑奴贸易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黄金、象牙和奴隶就是斯瓦希里(Swahili,源于阿拉伯语,意为“海岸”,指东非沿海地区)的主要“商品”,斯瓦希里人是从班图人(Bantus)那里获得这些“商品”的,再用这些“商品”与来自波斯湾、红海地区和印度的阿拉伯商人、古吉拉特商人交换念珠、纺织品和其他商品。斯瓦希里人称班图人为“咖味哩人”(Kaffirs),意为不信教者。“自古以来,阿拉伯人专门猎取非洲人,并把他们降服为奴隶。在东非,阿拉伯人的两项主要活动就是掠夺奴隶和搜购象牙。”“在摩加迪沙、布拉瓦(Brava)等地的阿拉伯奴隶商人无疑将通往阿拉伯和波斯、建立已久的贸易链条联结了起来……黑奴得自于班图沿海地区,即现在的坦桑尼亚、莫桑比克,此外还有肯尼亚。”宋人赵汝适记载了阿拉伯人的奴隶买卖:崑崙层期国(指东非海岸)“西有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虬发。诱以食而擒之,转卖与大食国(阿拉伯人)为奴,获价甚厚”。元人汪大渊亦记:加将门里(位于东非海岸)“通商贩于他国。气候常热。俗薄。男女挽髻,穿长衫。丛杂回人居之。其土商每兴贩黑囡,往朋加刺(孟加拉)互用银钱之多寡,随其大小高下而议价”。早期葡萄牙人在海外的

参见 [印] 贾伊·苏拉马尼亚姆著、何吉贤译:《葡萄牙帝国在亚洲》,第 28、230—231 页。

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 - 1770*,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48, p. 86

参见 C. R.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me Empire, 1415 - 1825*, p. 40.

库普兰德:《奴隶贸易和掠夺》,伦敦,1968 年,第 136 页。转引自姆贝耶·奎耶著、蔡锦涛译:《非洲大陆内部的奴隶贸易》,载《15—19 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第 155 页。

Vinigi L. Gottanell, “The Peopling of the Horn of Africa”, in H. Nevill Chittick & Robert I Rotberg (eds), *East Africa and the Orient*, Africana Publishing Company, New York, 1975, p. 67.

赵汝适原著、韩振华补注:《诸蕃志注补》卷上《崑崙层期国》,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0 年,第 247 页。周去非所撰《岭外代答》卷 3《崑崙层期国》亦有类似记载。

汪大渊原著、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校释·甘埋里》,中华书局,1981 年,第 297 页。

扩张过程中已使用非洲黑奴,达·伽马在1498年第一次闯入印度洋时,他的船队就使用黑奴从事行船劳役,不过当时黑奴主要来自于西非,后来才来自于东非。1498年3月,达·伽马的船队首航东非莫桑比克,除了为这里丰富的香料、宝石所吸引外,也注意到这里的黑人。葡萄牙船员阿尔瓦罗·维尔乌(Alvaro Velho)在《航海日志》中写道:“这儿的人皮肤黑色,体格健壮,属马法米德教派,语言与摩尔人相似……”达·伽马在当地捕获了4名黑人而离去。其后,达·伽马又在蒙巴萨(Mombasa)和马林迪(Malindi)沿海捕捉了一批黑人。1502年,达·伽马第二次远航东非,迫使基尔瓦苏丹签订条约,承认自己是葡萄牙的藩属,支付1500金梅蒂卡尔的贡金。达·伽马还掳走200多名当地妇女。

1505年7月,葡萄牙印度总督德阿尔梅达率远征队到达东非,先后侵占索法拉(Sofala)、基卢瓦(Kilwa)、蒙巴萨等地。至1509年,葡萄牙人征服了南起索法拉、北至布拉瓦的阿拉伯人主要聚居地,并在基卢瓦、莫桑比克和索法拉修建了要塞,作为其直接统治的据点;桑给巴尔(Zanzibar)、乌菲亚(Ufia)则沦为葡萄牙的朝贡藩属;葡萄牙与马林迪结成所谓的同盟,蒙巴萨、拉摩(Lamu)苏丹保留形式上的独立,葡萄牙人从而控制了东非沿海贸易以及对阿拉伯和印度的对外贸易。

葡萄牙人占领东非后即仿效阿拉伯商人和印度商人,大量贩运奴隶,东非的黑人被源源不断地运到阿拉伯半岛和亚洲许多地方充当奴隶,仅在1631年就有400名非洲人被当作奴隶从蒙巴萨运往麦加市场。同时葡萄牙人也把东非黑奴大量输入中国,18世纪游历广州的法国人贡斯当写道:“自16世纪以来,葡萄牙便习惯于将莫桑比克的黑人运到澳门。”

五、结 语

综上所述,明代来华的佛郎机人并非全是葡萄牙人,其中所谓的“黑番”占了大多数。“佛郎机黑番”中不仅有非洲黑人,而且也有亚、非地区其他民族的人。从明代史籍的记载看,明代的“佛郎机黑番”主要来自马六甲、霍尔木兹和东非沿海地区。上述三地也是葡萄牙人东来后最早建立的殖民地,与印度的果阿一道构成葡萄牙东方殖民帝国的重要据点,对葡萄牙海上帝国的形成和生存起了重要作用。葡萄牙不仅在这些地区实行殖民统治,而且还驱使当地人作为其侵略东方各国的工具。葡萄牙人在对中国的侵略扩张过程中曾大量使用东方奴隶。

(廖大珂,教授,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厦门,361005)

责任编辑:丁克定)

参见严中平:《老殖民主义史话选》,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450页。

参见K. G. Jayne, *Vasco da Gama and his Successor*, London, 1910, p. 47.

印 渡 贾伊·苏拉马尼亚姆著、何吉贤译:《葡萄牙帝国在亚洲》,第67页。

参见于贝尔·热尔波著、周崇阁译:《印度洋的奴隶贸易:历史学家面临的问题及如何进行研究》,载《15—19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第196页。

参见贝思韦尔·奥戈特著、蔡锦涛译:《东非、非洲之角和邻近国家之间的人口变迁》,载《15—19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第179页。

法 贡斯当著、耿昇译:《中国18世纪广州对外贸易回忆录》,载《暨南史学》第2期,2003年。